张伟明

与朋友下乡，行至途中，遇到一段正在翻修的路，新路与老路接合处，有一道明显的坎。习惯了城市道路的小车，因为底盘太低，试了几次也上不去。天色已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想找个工具相助也难。正当无计可施之际，同行的吴君提出一个方案：把车头调过来，改为倒车而上。

按这个办法一试，果然，问题迎刃而解——因为车子后部底座偏高，改为倒车方式后，后轮可轻易上去，而此时前轮也把前方的底座顺势抬起了，小底盘也就不再与那道坎“亲密”碰磕。

换个方式，倒车上坎，效果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思路一变天地宽”呵，拿这件小事来说，这一变，还真是至关重要，否则就只能继续受困于此了。

我常常觉得，一件事能办到什么程度，一个人能走到什么地步，思维方式非常重要。“一根筋”的人，也许可以把已有既定模式的事情做得很认真，干得很出彩，但要让它更上层楼，焕然一新，则勉为其难，近乎苛求。社会的进步，主要还是靠“发散型思维”来推动。思维发散，就经常创新，就能更大限度

马斗全

如今人们感慨或谈论世道人心，多有“人心不古”语。听此言每使人想到杜牧《自贻》诗“寂寞怜吾道，依稀似古人”之句，还有晚清名家何绍基书与林某之联云：“学有经法，通知时事；行无瑕尤，直似古人。”“古人之风”之语，如今多数时候成了人们称颂某人的客套话，意思是说该人有修养，忠厚、平和、沉稳、度量大、与世无争。而真正具有“古人之风”者，“依稀似古人”甚至“直似古人”，却并不多见。所以少数人的古人之风，即其心态与度量，便格外教人敬佩。

已故陕西师范大学霍松林教授，为名学者、名诗人。当年书中评论当代诗人之作，曾谈到何香凝女士悼念丈夫廖仲恺的诗。因古来所谓“悼亡”，并非悼念亡故者，而有其特定含义，即丈夫悼念妻子。具有较深传统文化修养的人，都清楚这一点。可惜后世许多人已不解其义而往往用错。何香凝女士悼念丈夫之诗，便题为《悼亡》，霍先生自然认为不妥。况且他评论何香凝诗时，适又看到臧克家谈毛泽东诗，错将毛泽东悼念战友的诗称作“悼亡”，于是觉得有必要顺便讲一下这个问题。因为何香凝是位受人们尊敬的伟人，霍先生不好说她错，便以“别开生面”称之，所写评语为：“潘岳妻死，作《悼亡诗三首》，极深感动人，此后因称妻曰悼亡，以‘悼亡’为题者皆夫悼其妻之诗。此则一反旧例，妻悼其夫，其别开生面……”其忠厚之

韩浩月

2019 年到来的第一天，在社交媒体上一句话也没有说，记得 2018 年到来的那天，在朋友圈写了句“愿世界和平”，得到了许朋友的点赞。而今年，唯想沉默地度过。

在时间意义上，新年除了称谓，以及一些仪式感的事物，它与平常的日子并没有太大区别——时间不会快一分，也不会慢一分，时间依然会像流水那样，覆盖一切，永恒的依然会永恒，短暂的依然会短暂。

我无时不渴望生命发生一些重大事件，却日渐习惯了这平凡、庸俗而又忙碌的生活——忘记了哪位作家说过类似的话，但这句话最近却时不时浮上脑海。

竭力地想过去一年发生了什么，我做了什么，脑海里一片空白，内心里一片茫然，这一年过得太快，乃至去年许下的愿望，还没来得及及仔细去规划、去考量，时间就喇地一声翻篇儿了。

2018 年我计划写一部小说。如果往前数我的年度计划，恐怕这个想法已经数度出现在我的宏愿当中。记得 2018 年初的时候，和一位朋友很认真地讨论一个问题：还能令你感到激动的事情是什么？或者说，你现在的最大的虚荣心是什么？

当时我的答案是：写作并出版一部长篇小说，一定是纸质的，一定要有些厚度，它要摆放在书店里的某个位置，最好通过橱窗可以看到，它不见得畅销，但每天至少有一位读者路过，买不买没关系，拿起来翻一下就好……这是一个美梦，是

郭慕清

手机静音了很久，久到我几乎快忘了自己的手机铃声。晨起，窗外雨潺潺落下，朋友来电。铃声响起时，我陡然一惊，竟还是《击鼓骂曹》。爱上听戏，也不过只有几年的光景，可错日茫茫，仿佛已过了小半生。在戏院，坐在一群白发须眉中间，黑发白衣，垂手如明玉，有些格格不入。可在声声慢里声声叹里，这戏这曲，却浸了我的心，蚀了我的骨，锦瑟年华悠然而过，任他鲜衣怒马，素面薄颜，我心素已闲。

闲心生，生活也就有了戏味。时光也如淼淼的水波，入了心。

起初，最喜欢听京韵大鼓，且很留心听大三弦、四胡、琵琶、低胡的演奏，只觉得那音色寂寥清绝，就像灯光昏黄的夜色里，佳人指尖香烟缭绕，烟圈袅袅，又妖娆，又寂寞；又像是无意间看到了旧光阴一匹陈缎，金缕丝早已落黄，牡丹花却开得正娇艳。

那时，把阎秋霞的《探晴雯》听了又听，坐车听，走路听，如厕听，舍不得摘下耳机。虽是《红楼梦》里早已看了十几遍的桥段，却入了迷，着了魔。“俏丫鬢抱屈天风流，美优伶斩情归水

不动声色

因，它使人习惯偷懒，甘愿跟着别人的感觉走。这种按部就班的处事方式，只会让人衰退落伍。与此相比较，我们更需要的是质疑精神。人的认知是有限的，前人或名人说的也不一定全对，每个人都可以勇敢、主动地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思索。敢于怀疑，敢于否定，才能踩出新路，拓出新天。哥白尼质疑“地心说”，所以形成了他的“日心说”；王守仁质疑先贤朱熹，于是有了阳明心学的大成；袁隆平质疑“无性杂交”学说，杂交水稻由此“柳暗花明又一村”。质疑，推动着历史车轮在“否定之否定”中不停步地滚滚向前。

有些坎，倒着才能上

地探索世界的真相，更大程度地挖掘出事物的各种可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不就是得益于当时换种模式干事创业，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被称为“圣人”的王阳明，幼年与爷爷等长辈赏月时曾有一首“打油诗”：山近月远赏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于天，还见山小月更阔。这首诗能够流传下来，固然与王阳明日后的成就有关(所谓“名人效应”)，但平心而论，对一个孩童而言，其看问题的角度，的确让长辈们震撼。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以独特的视角看问题，难怪王阳明能成为“三不朽”的人物。

换个角度看问题，需要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要时刻想到，世界是多元的，事物是多面的，很多事情并没有“标准答案”。横看成岭侧成峰，站在不同的角度，必有不同的收获，只要你勤于变换位置。曹冲称象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没有这么大的秤，怎么办？总不可能把大象给分尸了吧。办法还是有的，那就是寻找可拆分的代替物。这就是思维的作用。人们常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这话基本在理，若非如此，世界怎么能有如许发展？

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需要破除思维定式。惯性未必一向有效，经验未必总是可靠。“人云亦云”是思维固化的重要原

人啊，请多一点古风

心，令人可感。

浙江有位周明道大夫，业医以外又好诗，治文史，多有著述，其《观沧楼续笔》中有《悼亡》一则，对霍松林以上说法予以否定，并举了明末祁某死后其妻商景兰所作之诗和清代女诗人吴绛雪思念丈夫之诗来作证明，最后说：“这些例子，不胜枚举，早已别开生面于前矣。何霍教授之少见如此也。”从周大夫所举二诗看，知他所言未当。这两首悼念丈夫的诗，诗中既无“悼亡”一词，更未用“悼亡”之题，所以并不能用来否定霍先生“以‘悼亡’为题者皆夫悼其妻之诗”之说。也就是说，周大夫的批评是错的。

霍先生读到周大夫的批评后，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写文章去反驳甚至予以讥笑，而是给周大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为了这点小事，我写文章驳您，不太好。”他耐心讲了自己的道理，并举了不少例子，以说明周大夫之误。文革中曾多方照顾落难老诗人洪传经并为之送终而受到人们敬重的周大夫，是一个能虚心接受批评的人，《观沧楼续笔》中便有《三公指错》一则，感谢周采泉等老先生指出自己书中的错误。因他还拟出《观沧楼三笔》，所以霍先生信中说：您如认为您的《悼亡》一则也有错，不妨再写一则《霍公指错》，将来收入《三笔》。读完此信，真令人不胜钦佩，为霍先生的襟怀和风度叫好。古人所云于可竟之地以不竟胜之，此之谓欤？霍先生让周大夫自己去纠正书中的错误，其用心何其仁厚。周大

时光如流水，心如松

一名写作者的终极梦想。

但我不敢把它写进我的新年愿望清单里。事实上我不愿意把任何的愿望，以可查询的方式记录下来，我似乎在躲避着什么，更愿意用一些宏大的意象来掩盖某种不安，比如“愿世界和平”，连我都不相信这五个字是否真挚。

2018 年我成了一名悼文写手，这一年去世的人太多，每每一天的形容，至于上帝又想念什么所以又带走了谁这样的说法，更是显得有点像开玩笑。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只是创造者留下的痕迹更清晰一些，那些呕心沥血的创造者，也许不过是个奋斗着、奋斗着，发现工作已经与自己的欲望融为一体，名声只是意外得到的副产品，唯有不停歇地创造，才能让他们的心得以安宁。

2018 年，我的心也得到了安宁。夏天的暴雨之夜，我在一

条宽阔的马路边抛锚了，没错，就是那种宽阔的柏油路，一下大雨，就变成了海，一吨多重的汽车，在“海水”中变成了轻飘飘的船，午夜的海上，漂着无数这样的“船”。在那瞬间我感觉到有些无奈、有些荒诞，但却丝毫没有恐惧，甚至没有马上离开汽车的打算，那么静静地一个人坐在方向盘的后面，看着前面闪烁着黄灯的车尾，回头望着不断扎进“海”里的新“船”，心里的静慢慢变成了疲倦，想象着那天那样沉沉地睡去。想在第二天早晨阳光照射大地的时候，一地狼藉的街道，会写出怎样的“故事”。

2018 年，我为这条经常被淹没的街道写了两首诗，在去酒馆喝酒的出租车里写，在饭馆吃面的时候写。2018 年发生在我生命里最大的一件事是恢复了写诗的能力，这是少年时才喜欢的事，我曾以为这种能力已经永久丧失。

记得在入冬后的那个夜晚，朋友邀请到了一个类似客棧食堂的火锅店吃火锅，那晚的火锅店人声鼎沸，喝了几杯酒之后，我的朋友忍不住开始朗诵他的诗歌，这个时候，对面桌的年轻人，开始了他们的大合唱，我记得那首歌的歌词，“一根筷子哟，轻轻被折断，十双筷子哟，牢牢抱成团”，年轻人正是血气方刚，很快声音压过了我们，但我们这帮中年大叔觉得很高兴，因为年轻人的参与，火锅店的整个夜晚都充满了欢乐。

这就是我的 2018，我已忘记了这是进入中年后的第几个年份。这一年世界上或许发生了许多大事，但在我的生命里没有大事发生。我的内心像一棵松树，缓慢而平静地生长着，渴望着大风与雷电，也渴望微风与初雪……

“叹君王万种凄凉千般寂寞，一心似醉两泪如倾。愁漠漠残月晓星初领略，路迢迢涉水登山哪惯经。好容易盼到行宫歇歇倦体，偏遇着冷雨凄风助惨情。剑阁中有怀不寐唐天子，听窗外不住的叮当连连地作响声。”

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张国立在茶馆里唱了这个选段。当时，我不禁在想，剑阁中的唐明皇是后悔了吧？然而，悔恨归悔恨，思念归思念，倘若时光重来，我想唐明皇还是会赐死杨贵妃，就像是《色·戒》里，易先生再舍不得，也不会让王佳芝活着。少年时曾为温莎公爵的深情所感动，他爱不爱江山爱美人，为了辛普森夫人离家去国，历史解密，感天动地的爱情就像是一个笑话，深情款款的面具下面，要掩盖着的不过是英王府邸内的政见不同而已。

仓央嘉措感叹道，“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上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没有，没有，世上哪里会有什么双全法呢？

双全是枉然。

写故事的人儿呀，纵使写得再好再动人，韩小窗也不是唐明皇，他只是子弟书魁首；白居易也不是唐明皇，他是“诗王”，是自在的香山居士。唱歌的人儿呀，纵使唱得再好再深情，骆玉笙也不是唐明皇，他只是“金嗓鼓王”。而你与我更不是。

因，它使人习惯偷懒，甘愿跟着别人的感觉走。这种按部就班的处事方式，只会让人衰退落伍。与此相比较，我们更需要的是质疑精神。人的认知是有限的，前人或名人说的也不一定全对，每个人都可以勇敢、主动地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思索。敢于怀疑，敢于否定，才能踩出新路，拓出新天。哥白尼质疑“地心说”，所以形成了他的“日心说”；王守仁质疑先贤朱熹，于是有了阳明心学的大成；袁隆平质疑“无性杂交”学说，杂交水稻由此“柳暗花明又一村”。质疑，推动着历史车轮在“否定之否定”中不停步地滚滚向前。

有些坎，倒着才能上

地探索世界的真相，更大程度地挖掘出事物的各种可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不就是得益于当时换种模式干事创业，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被称为“圣人”的王阳明，幼年与爷爷等长辈赏月时曾有一首“打油诗”：山近月远赏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于天，还见山小月更阔。这首诗能够流传下来，固然与王阳明日后的成就有关(所谓“名人效应”)，但平心而论，对一个孩童而言，其看问题的角度，的确让长辈们震撼。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以独特的视角看问题，难怪王阳明能成为“三不朽”的人物。

良好的思维，来自善于动脑的习惯，更来自于生动的社会实践。以前面提到的那位吴君为例，他曾在某单位担任办公室主任多年，接触面广，学习精神强，平日处理的事情比普通人员多，所以在很多细节中可以看出其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是“历练”的结果。办法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见多识广，博采众长，断而敢行，办法才会多起来。向书本学，向社会学，向每一个人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尤其注重“事上练”，能力提升必定“功到自然成”。

换个角度，海阔天空，时刻保持活跃思维，积极投身火热实践，人生将变得更绚丽，世界将变得更多彩。

陆波岸

很多年前，我写了一篇文字惹了个大祸。写之前，我向刘教授做了汇报，刘教授带着我又做了该做的汇报。写完后，他做了审定。结果，这篇文字还是惹祸了。它惹祸的原因不是写不好，也不是有什么事实出入等问题，而是因为有人不高兴。这个不高兴问题很严重，严重到可以向刘教授问责，要刘教授担责的地步。

一个周末的中午，一位关心我的长辈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我，让我做好心理准备，万一刘教授不扛这个责任，这个锅肯定是甩给我。到时候，我被开除的可能都有。“他还没有找你谈话？”这位长辈问。我摇头。“他肯定会找你的，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位长辈拍拍我的肩膀说。

我是一个大山人，穿越无数羊肠小道来到车水马龙的都市，只为一个安身立命的饭碗。现在，握在手中的饭碗快被自己砸掉了，我心中瞬间泛起莫名的恐慌。每天，我把这份恐慌满满装在心里，表面若无其事地上班，晚上怀揣着这份恐慌入睡，梦里有时还若隐若现看到刘教授向自己走来的身影。

可是，我这么忐忑不安过了很长一段的日子后，也没有见刘教授找我，搞得那个关心我的长辈都觉得“不可能”“不可思议”。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件事后面怎么得以平息，也不知道刘教授因为这件事经历了什么。

后来，还是我主动在他面前多次提起这件事，说“非常不好意思，我写的那篇文章惹了祸，给您添麻烦了。”我每次说起，刘教授就一句话：“你废话，不说那些事了。”

有一个兄弟有着和我差不多的遭遇。那年“非典”横行，人心惶惶，据说果子狸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这位兄弟背着相机去拍果子狸，因为他不认识这个动物，被人误导把竹鼠当成果子狸给拍回来了。不幸的是，他那条战线上很多人都不认识果子狸，认为照片上这个动物就是果子狸，导致竹鼠带上果子狸的名号，变成白纸黑字和数以万计的读者的见面。

有读者认识果子狸，质疑声音顺着热线电话打了进来。责任一倒查，这个兄弟满满地扛着。有人要他写检讨书，要他直接面向刘教授做检讨。那时，这个兄弟刚刚参加工作，手里的饭碗还没煮熟，心想这次肯定是逃不掉了，没想到“非典”没把自己害死，先被果子狸给害死了。

他认真真把检讨书写好，惶恐不安地走进刘教授的办公室，准备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当着这位他上司的上司做深刻检讨。没想到，刘教授接过他的检讨书后并没有看，而是若无其事地把它轻轻放在办公桌上，然后请这个兄弟坐下，给他递了一支烟，语重心长地说，这件事不怪他，要他别把这件事当成负担放在心上，吸取教训，好好工作。

刘教授的话语间，没有冰冷的责备和严厉的训斥，只有温暖的安慰和满满的鼓励。后来，这位兄弟无数次和我提起这件事，言谈间充满着对人情世故的无限感慨，对刘教授的无限感恩。

日常工作生活中，不废话的刘教授，做起事来有节有奏、有张有弛，小处不失格局、大处更显情怀，再大的事情做起来照样举重若轻有思路、轻车熟路有担当。我们一直觉得，和这样有真水平、真性情的领导共事谋事，真心感到事不折騰没压力、人不纠结心不累，心甘情愿为事业付出辛勤的汗水与心血，并能从中收获个人的成长与进步、领悟处世的胸襟与情怀、学到为人的格局与担当。

2008 年 11 月的一个下午，他叫我和一个同事到他的办公室。他告诉我们，为了迎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50 周年，他策划了一个叫做“八桂大合唱”的大型报道，要走进广西 12 个民族自治县和南宁市 3 个民族乡，近距离感受各族同胞生活的变化，聆听他们的心声，让我们两个和他一起出去采访完成这个报道。

这是一个不小的报道，采访行程 4300 多公里，见报稿件达 6 万多字 15 个图文并茂的版面。但是，刘教授在策划这个报道时，几乎没有一个形成文字的方案，也没有召开任何一个讨论会议，一切运筹帷幄，成行在胸。我们进入他办公室时，只见他站在办公桌前，桌上放着一张广西地图。他简单地把策划意图、报道结构等内容和我们讲完后，指着地图征求我们意见，从哪里走起路比较顺，避免走回头路。我们 3 个人为此商量讨论前后不到 1 个小时，此后再也没有无休止的方案修改，没完没了的开会讨论。

历时 18 天的采访中，刘教授一路和我们走村串寨，聆听每一个温暖的故事，抓住每一个感人的细节。回来后，他没有再开什么会议讨论选题，直接按照出发前口头的方案来写稿组织版面，并全程把关按照一天一个版面的节奏，在自治区成立 50 周年庆祝大会第二天发完整个报道 15 个版。

这组报道连续获得了三个奖项。有新闻阅读员点评说，这些报道记述深入、气势宏大、宣传效果持久，是一组全面反映广西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从形式到内容结合得较好的策划报道。但是，整个 6 万多字的报道没有刘教授一个署名，版面策划一栏写“本报记者组策划”，采写一栏是我另外一個同事根据各自负责来写的版面署名。现在，刘教授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已经好几年了，一个不像领导的领导过上了真正不是领导的生活。但是，很多人和他的关系还是一如当年那样的亲密、那样的亲切，很多人和他见面就直呼其名，大家依旧乐乐呵呵，没有太多的官腔和客套，没有太多的阿谀奉承的寒暄和做作，酒深情更满，人走茶不凉。

我们几个晚辈奉过十天半个月不见他的，常常会不约而同地说“好久不见刘教授了，约一下他搞两杯”。有时候，他惦记我们了，会拿起电话问候交流，更多时候是相约“搞两杯”。席间，大家不分级别，不分辈分，天南地北，谈笑风生。刘教授要买单时，我们谁都指不定，说一句“你废话”，我们谁都不敢废话，只好看他给商家掏腰包买单。但是，他一举一动显示出来的长者风范，每次都给我们多一份感恩、多一份钦佩、多一份敬仰。

不废话的刘教授

陆波岸

每当有人端着酒杯站起来，准备到刘教授身边敬酒时，都被他挡回来，“你废话，赶紧回去”。然后，他端着酒杯把对方推回座位去，很多时候是双方推推搡搡走到半道时，两个杯子碰出一声脆响，全场一阵欢呼，美酒顺着仰起的脖子直落九曲回肠。

刘教授职业不是教书育人，是我曾经革命过的地方一个领导。因为他是高级职称，我们几个没大没小的晚辈没有以职务官衔称呼他，很多场合直叫他刘教授。他是我上司的上司，按我当时的岗位，我要走好几层才到他的那个级别，直到现在我也没走到那个级别。

但是，刘教授当领导没有领导的样子。当然，这和“站没站样，坐没坐样”不是一个样。他这个领导的样子，很多时候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搞得那一点领导的架势和威严都没有，好像给他敬酒的人是他的领导一样。当然，这不仅仅是酒桌上的谦逊，还有工作上的关怀、包容和担当。

很多年前，我写了一篇文字惹了个大祸。写之前，我向刘教授做了汇报，刘教授带着我又做了该做的汇报。写完后，他做了审定。结果，这篇文字还是惹祸了。它惹祸的原因不是写不好，也不是有什么事实出入等问题，而是因为有人不高兴。这个不高兴问题很严重，严重到可以向刘教授问责，要刘教授担责的地步。

一个周末的中午，一位关心我的长辈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我，让我做好心理准备，万一刘教授不扛这个责任，这个锅肯定是甩给我。到时候，我被开除的可能都有。“他还没有找你谈话？”这位长辈问。我摇头。“他肯定会找你的，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位长辈拍拍我的肩膀说。

我是一个大山人，穿越无数羊肠小道来到车水马龙的都市，只为一个安身立命的饭碗。现在，握在手中的饭碗快被自己砸掉了，我心中瞬间泛起莫名的恐慌。每天，我把这份恐慌满满装在在心里，表面若无其事地上班，晚上怀揣着这份恐慌入睡，梦里有时还若隐若现看到刘教授向自己走来的身影。

可是，我这么忐忑不安过了很长一段的日子后，也没有见刘教授找我，搞得那个关心我的长辈都觉得“不可能”“不可思议”。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件事后面怎么得以平息，也不知道刘教授因为这件事经历了什么。

后来，还是我主动在他面前多次提起这件事，说“非常不好意思，我写的那篇文章惹了祸，给您添麻烦了。”我每次说起，刘教授就一句话：“你废话，不说那些事了。”

有一个兄弟有着和我差不多的遭遇。那年“非典”横行，人心惶惶，据说果子狸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这位兄弟背着相机去拍果子狸，因为他不认识这个动物，被人误导把竹鼠当成果子狸给拍回来了。不幸的是，他那条战线上很多人都不认识果子狸，认为照片上这个动物就是果子狸，导致竹鼠带上果子狸的名号，变成白纸黑字和数以万计的读者的见面。

有读者认识果子狸，质疑声音顺着热线电话打了进来。责任一倒查，这个兄弟满满地扛着。有人要他写检讨书，要他直接面向刘教授做检讨。那时，这个兄弟刚刚参加工作，手里的饭碗还没煮熟，心想这次肯定是逃不掉了，没想到“非典”没把自己害死，先被果子狸给害死了。

他认真真把检讨书写好，惶恐不安地走进刘教授的办公室，准备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当着这位他上司的上司做深刻检讨。没想到，刘教授接过他的检讨书后并没有看，而是若无其事地把它轻轻放在办公桌上，然后请这个兄弟坐下，给他递了一支烟，语重心长地说，这件事不怪他，要他别把这件事当成负担放在心上，吸取教训，好好工作。

刘教授的话语间，没有冰冷的责备和严厉的训斥，只有温暖的安慰和满满的鼓励。后来，这位兄弟无数次和我提起这件事，言谈间充满着对人情世故的无限感慨，对刘教授的无限感恩。

日常工作生活中，不废话的刘教授，做起事来有节有奏、有张有弛，小处不失格局、大处更显情怀，再大的事情做起来照样举重若轻有思路、轻车熟路有担当。我们一直觉得，和这样有真水平、真性情的领导共事谋事，真心感到事不折騰没压力、人不纠结心不累，心甘情愿为事业付出辛勤的汗水与心血，并能从中收获个人的成长与进步、领悟处世的胸襟与情怀、学到为人的格局与担当。

2008 年 11 月的一个下午，他叫我和一个同事到他的办公室。他告诉我们，为了迎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50 周年，他策划了一个叫做“八桂大合唱”的大型报道，要走进广西 12 个民族自治县和南宁市 3 个民族乡，近距离感受各族同胞生活的变化，聆听他们的心声，让我们两个和他一起出去采访完成这个报道。

这是一个不小的报道，采访行程 4300 多公里，见报稿件达 6 万多字 15 个图文并茂的版面。但是，刘教授在策划这个报道时，几乎没有一个形成文字的方案，也没有召开任何一个讨论会议，一切运筹帷幄，成行在胸。我们进入他办公室时，只见他站在办公桌前，桌上放着一张广西地图。他简单地把策划意图、报道结构等内容和我们讲完后，指着地图征求我们意见，从哪里走起路比较顺，避免走回头路。我们 3 个人为此商量讨论前后不到 1 个小时，此后再也没有无休止的方案修改，没完没了的开会讨论。

历时 18 天的采访中，刘教授一路和我们走村串寨，聆听每一个温暖的故事，抓住每一个感人的细节。回来后，他没有再开什么会议讨论选题，直接按照出发前口头的方案来写稿组织版面，并全程把关按照一天一个版面的节奏，在自治区成立 50 周年庆祝大会第二天发完整个报道 15 个版。

这组报道连续获得了三个奖项。有新闻阅读员点评说，这些报道记述深入、气势宏大、宣传效果持久，是一组全面反映广西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从形式到内容结合得较好的策划报道。但是，整个 6 万多字的报道没有刘教授一个署名，版面策划一栏写“本报记者组策划”，采写一栏是我另外一個同事根据各自负责来写的版面署名。现在，刘教授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已经好几年了，一个不像领导的领导过上了真正不是领导的生活。但是，很多人和他的关系还是一如当年那样的亲密、那样的亲切，很多人和他见面就直呼其名，大家依旧乐乐呵呵，没有太多的官腔和客套，没有太多的阿谀奉承的寒暄和做作，酒深情更满，人走茶不凉。

我们几个晚辈奉过十天半个月不见他的，常常会不约而同地说“好久不见刘教授了，约一下他搞两杯”。有时候，他惦记我们了，会拿起电话问候交流，更多时候是相约“搞两杯”。席间，大家不分级别，不分辈分，天南地北，谈笑风生。刘教授要买单时，我们谁都指不定，说一句“你废话”，我们谁都不敢废话，只好看他给商家掏腰包买单。但是，他一举一动显示出来的长者风范，每次都给我们多一份感恩、多一份钦佩、多一份敬仰。